

理学思想研究

元代与明代前期

唐宇元 著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China News United Publisher

理学思想研究

元代与明代前期

唐宇元 著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China News United Publisher

元代与明代前期理学思想研究/ 唐宇元著.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CHINA NEWS UNITED PUBLISHER), 2011.11

ISBN 978-988-15326-6-4

I .元… II .唐…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

元代与明代前期理学思想研究

作 者 唐宇元

责任编辑 李向欣

编 辑 吕芙蓉

装帧设计 郭书泽

出版发行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CHINA NEWS UNITED PUBLISHER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卫强校村118号

网 址 www.zhonglianshe.com

邮 箱 zhonglianshe1@126.com

开 本 880 × 1230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1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一版

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专家及媒体点评：

- 该书突破了理学研究中，只重程朱陆王的局限，对理学不同时期的重要派别，特别是对元代理学，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大大拓展了理学史的研究领域，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史研究动态》97年5期

-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

——《光明日报》85.4.17

- 该书元代理学等部分，开垦了大面积的学术荒原，填补了不少的研究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88年第5期

- 元代理学向来为研究者所忽略，本书用较多篇幅进行论述，填补了这一空白。

——北师大陈其泰教授

- 元代理学于宋明两代有承先启后之功。本书独标一编，能起沉发潜，使这一历史进程更显完备。

——宁波大学姚公骞教授

- 建国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和教科书，很少谈及元代的理学思想，即使谈及也极简要。本书对元代及明代前期理学作了系统研究，实乃一大贡献。……研究元代的理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一大课题，因此本书的研究是一大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立文

- 整个元代和明初这一大段理学史的开拓和挖掘，相当深广，充分反映了侯外庐学派的独立自得的精神。……对于朱陆异同的分析，挖掘出一

些很好的材料，有独到的见解。

——陕西师大教授赵吉惠

● 不少论断，精粹坚实，不乏新意，……如元代理学出现了朱陆和同(合流)的情况；王学远绍陆九渊，近承陈献章，而又杂糅了朱学的若干思想成份等，把理学思潮的渊源流变，勾勒出一个严密、科学的逻辑体系。所有这一切，丰富了理学史的研究成果。

——中国史研究，89年2期宋明理学史专家评论综述报导

● 元代理学不仅是对宋明理学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对于冲破南北‘声教不通’促进汉蒙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著作和教科书中，或其他一些著作中，很少对元代加以论述，即便讲到一点，也是简乎其简，不能把握其要领。本书(指宋明理学史)元代理学部分总结了赵复、许衡、刘因、饶鲁、吴澄等人的思想，阐明了元代理学研究，作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又称，该书元代理学部分，精辟的论述，提出“理学发展到元代，已发生变异和出现了朱陆‘和同’的倾向，其王阳明学派之所以兴起，不仅远绍陆象山，而且是融合了朱学的一些精神，……”等等论点，堪称精辟”。

——江西大学校长陈正夫教授

中国史研究，89年2期宋明理学史专家评论综述报导

● 在其《论吴澄的学术归向与教育理论》一书中称：谓唐宇元先生对元代吴澄“和同”朱陆的思想研究，对后学甚有“启发”，对元代思想研究具有开创性，是“功不可没”。

——台湾中兴大学黄煌兴先生

● 在其《吴澄易学研究》著作中，论及元代吴澄思想是宋到明之间思想发展的递进环节时，即大段的引用唐宇元的论说，作为他的理论依据，谓是“无可匹的”。

——台湾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涂云清教授

目 录

第一部分 元代理学思想及代表人物

元代经学与理学刍议	3
一、元代经学的历史地位	3
二、元代理学简说	10
元代的朱陆合流与元代的理学	21
一、朱熹陆九渊去世之后的理学情况	21
二、朱陆合流的几种情况	24
三、对朱陆合流的分析及其与明代王学的关系	29
元代的实学思想	33
一、元蒙社会与儒学大势	33
二、赵复、刘因的理学及其实学思想	36
三、许衡、郝经用世的实学思想	41
四、吴澄“会同朱陆”的实学思想	50
五、金履祥、许谦在经学中的实学思想	58

北方理学的传授者——赵复及其思想	64
一、简在心得	65
二、鄙薄事功与夷夏之辨	66
三、传授朱注《四书》与元代科举	68
四、经学思想片段	69
许衡思想及其在元代理学史上的地位	71
一、许衡的天道思想	72
二、许衡的心性思想	74
三、对许衡思想的评价	76
刘因的理学思想	79
一、刘因的身世和学行	79
二、刘因的天道论和心性说	80
三、刘因关于齐物、观物的思想	84
四、返求六经与“古无经史之分”的经学思想	87
饶鲁的理学思想	90
一、天道思想	90
二、人性论	92
三、识见天理的方法	93
吴 澄	98
引 言	98
一、吴澄的身世和学行	99
二、吴澄的哲学思想	106
三、吴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115
四、结束语	121



第二部分 明代前期理学思想的发展

朱学在明代的流变与王学的缘起	127
一、朱学在明代的流变	127
二、朱学体系中暴露的问题	130
三、王学与朱学的异同	132
宋濂的理学思想	135
一、宋濂的生平和学术渊源	135
二、天道观和天地之心	137
三、吾心为“天下最大”	139
四、识心、明心的方法	142
五、调和朱陆的态度	147
刘基的理学思想	149
一、天道观	149
二、心性论和道德修养说	152
三、借经明义的《春秋》学	155
方孝孺的理学思想	160
一、方孝孺的理学和行《周礼》、辟“异端”	160
二、方孝孺的用世和无神论思想	168
曹端的理学思想	176
一、太极与理气论	176

二、论性	179
三、道德修养与“孔颜之乐”	181
薛瑄的理学思想	184
一、薛瑄的理气论	185
二、论性与“复性”方法	188
三、薛瑄的学传——“关中之学”	191
吴与弼理学	195
一、吴与弼的学行	195
二、吴与弼的“静观”修养论	196
三、吴与弼的理学与王学的产生	200
黄绂、张元忭对王学流弊的批评	204
一、黄绂的学行与“艮止”说	204
二、张元忭的理学思想	216
程朱理学何时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	226
一、朱学在南宋末年被解禁	227
二、朱学在元代只是作为试士的官学	230
三、朱学在明代确立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	233
论理学的三教合一与无神论问题	238
“道统”抉微	244
一、道统说的缘起和“失传”问题	244
二、韩愈被排出道统的问题	245
三、成于朱熹的道统论	246
四、道统十六字“密旨”的意义	249
五、道统论与天道人伦	253

元代经学与理学刍议

近30年来，对元史研究取得许多成果，但比较起来，在元史研究中对思想文化方面，尤其对元代经学与理学方面的研究，虽说也出了一些论著，但似嫌不足。即便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专业著述中，对元代这一段也是薄弱的地方。本人对元代经学理学方面，未知深浅，略有涉足，然无多发明。这些年来边读边思，仍有一些粗浅未莹的想法。这里要说明的是，其所以把经学与理学放在一起谈，因为这二者是一体的两个方面。在宋以后，儒学进入义理化、哲理化的理学阶段，以理学去疏解经学，或者说从经学疏发理学，这二者常是这样的关系。所以理学家往往又是经学家，经学家往往又是理学家，二者相即不离。今日不妨就这方面写些想法，以就教于元史研究的专家学者。

一、元代经学的历史地位

大体说来，中国思想文化史是以儒学为中心的，儒学又是以经学为基础的。这是历代所以不断钦定经本选取疏本，作为国家大事的原因。虽然佛道二教在历史上某一时期能占坛一时，但终究改变不了这一基本情况。因此，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对于经学的了解与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又就经学历史来说，它从先秦产生，到汉唐的训诂，到两宋经训的义理化，再到清代汉宋结合的考据学。在这个经学发展的过程中，元代经学即处于宋到明清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

提起元代，虽不及百年，但在经学上的经传纂疏，疏释议论，其著述数量却超过两宋。其经说每有新义，为进一步推进与完成宋世开始的经学义理化过程。元代义理化的多部经疏，加上朱熹的经疏，使明初得以钦定为国学定本，也为清代学术史上极有建树的考据学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应该说，元代的经传纂疏，从经学史上来说，是一段辉煌的时期。经学史上在元代的这一段奇特的现象，与元代其他方面的思想文化一样，往往被治史者所忽视，甚且有曲意贬斥的地方。尽管明清的儒学经生不少就是取自元代经学的成果，有的经学著述就是沿着元代经

疏发展的，其轨迹昭昭可寻，但却又不提这个来路。其原因，或如前辈学者陈垣先生说的，元明鼎革之后，明儒心存民族偏见^[1]。也许这个原因，以致一位在经学理学上有地位的吴澄，因为由宋入元，又仕于元，在明代未能按例进入孔子庙庭。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其影响所及，由明清甚至到今天，对元代经学每每感到生疏。

在这里，我们不妨举几个元代经学人物及其经著，简单地说明元代经学的意义和历史地位。

吴澄。宋末元初人，其经学大半成就于元代。对于吴澄，治思想文化史者多视为理学家。其实，他一生冷壁孤灯，矻矻穷年，其成就多在经学。笔者于1982年发过吴澄思想的拙文^[2]，其中有关经学一节收入台湾出版的《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那里面所谈简单，并不全面，今有必要对吴澄经学再作论述。当然这里也只是作一个大体的钩要。吴澄尊奉朱学，是继朱熹以义理治经的路数。他多次表明他是要完成朱子治经的未竟之业。朱熹生前基本上完成《诗》和《四书》的义理疏解。对三《礼》有所涉及但远未完成。至于《易》、《书》，也只是一些议论，更谈不上有什么经注疏释的著述了。为此，吴澄终其一生几十年，对最为难治的三《礼》与《易》、《书》、《春秋》，基本上完成了朱熹的遗愿，成《五经纂言》（《诗》除外，实四经）。吴澄也像朱熹一样，朱熹在大去之前的一刻，已气如游丝，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死时墨迹犹有未干。吴澄也在咽气之前的一刻，已握笔颤抖，仍在修改《易》著。其治学精神至死不辍，犹令我辈学子感叹再三。

关于吴澄治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他是重在《仪礼》、《礼记》，而尤重《礼记》。本来，朱熹对三《礼》极为重视，以为“三《礼》体大”^[3]。在他看来，《仪礼》是经、是纲，《礼记》是《仪礼》的传。于是他主张将这二《礼》混编为一，以传附经。他为此大力筹措规划，并着手写《仪礼经传通释》。但只是一部分草稿，大部分还没有完成。其后，他的弟子黄榦、杨复，虽然也用心于此，但也没有完成朱熹的遗愿。到了吴澄，他要继续完成朱子“未尽之意”。但吴澄反复研读《仪礼》、《礼记》，同意朱熹所说的这二《礼》是一经一传，但吴澄不同意朱熹将这二《礼》以经附传，混编一体，主张将这二《礼》分开，不能混一。其理由是很难将传之性质的《礼记》分割编入经之《仪礼》中去，有些篇籍性质不同，经传之间难契合。吴澄的办法是将这二《礼》作部分调整，并移入大戴和郑注本《礼记》中的一些篇目，以后再将二《礼》分别编次。具体说来，吴澄以《仪礼》17篇为经，把《礼记》中的《奔丧礼》等2篇，大戴《礼记》中的《公冠礼》等3篇，郑注《三礼注》中的《王君明堂礼》等3篇，以上3部分共8篇，汇为《逸经》，附入《仪礼》。吴澄又将《礼记》中的《射义》、《冠义》等篇，条分为10篇，称为《仪礼传》，也附入《仪礼》。这样一来，吴澄新编的《仪礼》本身，也就有经有传，以类相从，经与传相契，且又辑入遗篇，面貌一新，俾使治经者视为“难



治”的一部《仪礼》，得见崖略，得以读通。

至于《礼记》，有说是孔子之后七十子的论说，原是汉以来凑集的本子，来源不一，内容混杂。但吴澄仍保留《礼记》这一经的历史地位。对于《礼记》的混杂问题，他的办法是用小戴《礼记》作为基本，把其中一些性质上属于《仪礼》的，分别抽出来置于《仪礼》，然后将余下来的诸如《王制》、《檀弓》、《郊特牲》、《礼运》等36篇，再按类分为4个单元。然后，吴澄又“用功最勤”（黄百家语）地加以义理性的纂注疏释，成《礼记纂言》。

吴澄对《仪礼》、《礼记》编次疏说，采取既大胆开阔又谨慎合理的做法，比起朱熹高明了许多，这在经学史上诚是一大贡献。后世经学儒生，虽然说他“僭圣”“恣意妄为”，但他们读经治经，实际上又参用吴澄的编疏本。其后，明代大儒王阳明尽管不是朱子后学，对经学比较保守，反对朱熹《大学》格物补传，但他对吴澄编疏的《礼》经本极为佩服，称吴的《纂言》“多所发明”，是学《礼》者不可少的读本。^[4]清代一位湛思诸经的大家万斯大，对《礼记·祭法》中“祖宗”二字，认为郑玄、王肃、长孙无忌等汉唐疏说，俱无得其要，只有吴澄能“独得”其机。^[5]三《礼》以外，吴澄又研治《尚书》，成《书纂言》。说起《尚书》这部上古的历史文献，则比三《书》更是迷雾重重，至今还在公说婆说地争论这一部经的来历和真伪。在这里只说一些与吴澄治《书》有关的背景情况。这部《书》经，先有汉初伏生所出的今文《尚书》，其后又从孔壁出了古文《尚书》。出于孔壁的古文《尚书》，为孔子后人孔安国作注释性的传，以后就称为孔传古文《尚书》。这部《书》，比起伏生的今文《尚书》，多出了十六篇（称《逸书》）。这部孔传古文《尚书》，在魏晋时一度列为官学。到西晋末年，因战乱亡国，则《尚书》的古文本和今文本都说是散失不见了。未几，继起的东晋有个叫梅颐的人，他献出了他所得到的古文《尚书》，并且也讲出了是由魏末郑冲传下来的根据，说这是当初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传本。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今文《尚书》，也是在梅氏所献古文《尚书》中保留下来的。至唐代孔颖达受命编定的《五经正义》和以后编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的梅氏所献的古文《尚书》。这件事到了宋代，尤其是吴棫、朱熹对这部古文《尚书》起了怀疑，但也仅是怀疑而已。朱熹与蔡沈作《书集传》，仍对这部《书》详作疏释，只是在每篇之下注明是今文还是古文而已。不仅如此，朱熹在他的理学研究中，仍然引用古文《尚书》的一些篇籍。例如他引用古文《尚书·大禹谟》篇“十六字心传”，作为他道统论的先圣遗典。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到了吴澄这里，经过他的一番考订，他比起先师朱熹更进了一步。他不仅怀疑，而是考定梅颐拿出来的古文《尚书》本是假的，是一部伪造的书，不是汉代孔安国从孔壁所出的那种真古文《尚书》。但是他又说这部伪书是假中有真，即在这部书里面的今文《尚书》部分是真的，是伏生当初所

出的今文《尚书》。为此，吴澄把这部古文《尚书》中的古文篇目全部抽出来编在一起，不加疏解，等于弃置一旁。而将留下的今文篇目汇辑一起，详加纂注和疏释。然后将这两部分又汇在一起，成了一部吴氏《书纂言》。

吴澄决然定古文《尚书》为伪书，对后世影响很大。与吴澄同时代的赵孟頫亦有此举，但其影响则无过于吴氏。明代的梅鷟，尤其是清代的阎若璩，认为吴氏的识见迈越朱子，“出朱子右”。^[6]他们公开标明是直承吴氏之说。阎氏更详细辨考古文《尚书》为伪，实是充证吴澄之说。^[7]

吴澄在《书》学中，以义理疏经，发挥新义。例如朱熹治经是在于求二帝三王之心，吴澄也沿着这个路数，但他更着重以理学态度去疏说经学本旨。理学关注的天道之天，或所谓本然之天，是认识范围的理性之天，不是客观的实在之天。朱熹说这个天就是天理，理的根本。而吴澄视天的本质是民，并不是先秦以来疏说天与民的比同，而是直接提出天即民，“民即天”，^[8]民意就天意。在他看来，天的本质就是如此，也本来如此，是天的当然之则。这就是天道。本着他提出的这个天道观，在《书纂言》的《皋陶谟》、《高宗彤日》、《洪范》等篇中，吴澄疏说天非天子一人之天，天下不可以天子一人“自治”，天子当与民“共治”。他把他的天道观引申的人道，在先秦有过这类思想，如所谓天听民听这类提法，但远非吴澄从天的本质来揭示天道。他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一种超前的民本思想，为理学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后世黄宗羲带有近世启蒙意义的君民共和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发挥了吴氏这一思想。就吴澄《书纂言》的思想意义远不止这些，这里只是举其一例而已。

就吴澄来说，他在经学史最具影响的是《易》学。《易》本卜筮，是卦爻及卦爻辞组成的，古时以求卜问占行世。后有《十翼》为传，谓《易》有弥纶天地之道，包容万有，遂至汉时刘歆奉为经典，视为“三古”、“四圣”的古圣遗宝，列为五经之首，为儒教之大本，为着历史的变化、时代的需要，儒学经生便不断疏发出种种《易》说。而原本符号性的卦爻，便为他们提供了自由其说的空间。由之治《易》者蜂起，在汉魏最著者有孟京象数、王弼义理。历代经生倘若对五经之首的《易》学不能自说一夸，自撰一本，似不能成为名家大儒。故其《易》学蹊蹊如此，由汉至清，《易》著累至 2000 多种，其说逾至百家。清人归纳诸家为两派六宗，实是简单化了。

其间，元代《易》著见于文字记载的，将近 250 种之多，能卓然成家的《易》学家有 30 多人，在这当中，吴澄是一位有影响的“巨擘”。^[9]

吴澄的《易》学著述，有《易纂言》、《易纂言外翼》，及其《全集》中的一些《易》论。他说他所治的五经中，对《易》经“用功至久，下语尤精”，“有功于世为最大”。^[10]他的《易》学参取宋代吕祖谦、朱熹及项安世之说，也兼取汉魏孟喜、京房、王



弼和宋世邵雍的余绪。但他不拘陈说，而是洞契《易》微，别出机杼，构建一套自有体系的《易》学观。吴澄提出，儒学当以经学为基础，经学又当以《易》学为根本。而《易》又当以经统传，以经制义。对《易》之经部，吴澄又首在于“取象”，举此卦画、卦名、彖爻辞等，都在取象范围。“象”者像也，即类象、象征，或叫物象。如八卦就是远取近取，观物取象，显示万事万物的八个类象。由象类之间比拟类推，即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并伴生卦爻辞。而后万物资以生生，成天地人。因为这个原因，四库馆臣谓吴氏《易》学是“一决于象”。^[11]

吴澄由“取象”，而对通例性的“象例”重作“常例”、“特例”的整顿与运用。其间，由“取象”解乾坤二卦，变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及卦爻辞，并新解“卦变”。“卦变”即“爻变”的途径，他为此提出的“六子十辟”、“隔八缩四”等等关节，摒除汉代《易》学“飞伏”、“旁通”的无根之说。由此，吴澄对“卦主”、“正体”、“互体”（下下体的“互卦”），以及“复体”、“倒体”、“半体”、“二体”的《易》例，包括汉以来的“五行纳甲”、“十二消息”（即十二辟卦）等，未尽从前人，而是订正前人之说。对其象例卦体、意义和运用，吴澄有不少自己的看法。有的“爻位”、“复体”、“倒体”等，基本上又是吴氏的创说。从而吴澄的《易》学体系比较清新，又圆融一体。例如在他的体系中，任由一卦可通他卦，任由一爻可通他爻。

这样，在吴澄的《易》学体系中，由“生卦之前”到“成卦之后”，能多少呈现它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能多少呈现它的自有逻辑与协律性，使《易》学得以据实地义理化。所以吴澄在《易》学上反对离象说义、离象言理，主张理寓于象，象在数先，进而反对离经就纬和舍经求传。有说吴澄属于象数派，但他的象与数不是颠倒的，与邵雍的象数正好相反，邵氏从卦变的倍一加法，以数排布卦变，构成以数说象，以数阐理的《易》学体系，让人感觉这是邵氏主体外化出来的一套，不如吴澄以象为根本的据实性。

不仅如此，吴澄在《易》学上还显示出少有的求实勇气。在这方面大要说来，一是《易经》的经本问题，在吴澄看来，今世流行的是周的《易》本，不是古传的唯一的一部。古本当是伏羲《易》、夏《连山》、商《归藏》的古《易》，应当求得这些古本。二是他对《周易》用吕祖谦、朱熹本，复又加以改正错乱，重订句读，使一些经卦得以协韵通读，明其意义。三是将《易》经厘分为上下2篇，以显经纬与纯杂的区别，使人更易窥略大义。四是他的以史证《易》，虽在他先后也有个别《易》学家提出过，但无如吴氏更大胆言之，成为后世章学诚“六经皆史”的一个背景。五是吴澄对于《易传》“子曰”二字，经他考定，大胆删去。这不是他不尊孔，而是为了恢复先圣古本的面貌。其他还有一些，但就以上5点来说，在当时视《五经》为神圣的历史条件下，虽不乏有人

发过疑经改经的事，但鲜少像吴澄这样对经典稽疑扶奥，采取大胆决然的态度。所以，吴澄《易》学著述对后世甚有影响。朱枫林、黄宗羲等《易》学名家即取用了不少吴澄的《易》学成就。总之，吴澄对《易》、《礼》、《书》等经学论著，在经学史上是有地位的，清四库馆臣称他的经学为一代“巨擘”，这种有分量的话不是随便说的。

前已说过，元代经学名家不少，除吴澄之外，其卓卓名籍者如俞琰、丁易东、王申子、吴师道、张理、陈栎、黄泽、董中行、雷思齐、熊良辅、熊朋来、赵沅、齐履谦、王充耘、陈浩、汪克宽、刘瑾、董楷、胡一桂、胡炳文、陈师凯等等（其中个别是宋末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赵复北传程朱之学之后，尤其在许衡力推程朱之学之后，为推进程朱经注传疏，为程朱之学列于试士程式等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要指出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儒学经生对繁多的经学著述，作汇集、整理、考辨、取舍，并加己意疏释的多部经学汇编，成为集说会通之类。这种经学汇编的出现是儒学进入宋代义理化、哲学化以后，在元代显示的经学的成熟性。因而程朱为主的儒学，经元代成为官学以后，在明初得以钦定为国学。这个变化，是元代出现经学汇编之类的集说会通创造了条件。这从儒学的立场来说，元代经学其功尤不可没。

这在经学史上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这里有必要加以申述。在经学史上，刘邦立国，汉武定儒学一尊，宣帝临阁称制，在石渠阁辩定经学。至唐世又钦定《五经正义》。在这以后历八百年，朱元璋立国，即命刘三吾选辑朱学范围的《书传会选》，作治改便览。又在朱元璋与解缙的问对中，提出“修业”问题。解氏上万言书，谓当辑集周孔至程朱的圣贤经传疏说，为“太平制作”。^[12]刘三吾、解缙这两个人原是饱饫儒学尤其程朱之学的人。他们对明太祖的这番说词，实为元代经学的起用起了造势和导引作用。故在解缙上书之后，遂有明成祖下诏敕翰林学士胡广“统会”经注疏释，择定“精义要道”，“类聚成编”，“以垂后世”。^[13]胡广受命，依元代科试条制，扩大规模，主持编定《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作为3部《大全》根本的《五经大全》以程朱之说为规范，其中《易》用董楷、董真卿、胡炳文、胡一桂等四家的传义会通。《书》用元代陈栎、陈师凯的纂疏旁通。《诗》用元代刘瑾的通释。《春秋》用元代汪克宽的纂疏。《礼记》主要用元代陈浩的集说。至于《四书大全》，则多取元代宿儒陈栎及胡炳文等，依朱熹《集注》发挥的集义纂疏。其《性理大全》是一部天道心性方面的理学著作，属语类汇编，上至周孔，下逮程朱及程朱后学。其中不少是采自元代人的性理之说，吴澄亦在其中。

3部《大全》修成之后，胡广等40多人晋级赐币，并由礼部赐宴。明成祖又



特为《大全》作序，牟于卷首，成为举国的政治大事。尤要指出，明成祖的御制序实际上就是一道诏书，他以钦命的口吻说，3部《大全》颁行天下，要“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并且强调，要承“先王之统”，“成熙雍之治，将必有赖于斯焉”，即治国有赖于3部《大全》。^[14]很明显，3部《大全》不仅是科试定本，而且是国家统一的指导思想。由此，程朱之学，主要是朱学，从法定的意义上，正式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成为官方哲学。也从法定的意义上，《大全》替代了唐代的《正义》，正式结束了汉唐的经训儒学。讲到这里，或者有人要问，出现于宋代的程朱之学在宋元时期已产生很大影响，何以直到明初才钦定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是因为一个思想家提出的思想往往是超前的，而被统治阶级接受又往往是滞后的。因为这须要有一个在时间上或长或短的理解、考验和接受的过程。汉石渠阁定经，唐定《五经正义》，也有这个过程。这可以说是思想史上的一条规律。对于上面的一些重大问题，请详见笔者《程朱理学何时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一文。^[15]

以上只在于说明，明初钦定的《五经大全》，基本上采用元代的经学著述，这显示了元代经学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可以说，元代经学这种命运在经学史上是一大关节，也是儒学史上的一大变局。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当时或稍后的人对3部《大全》有不同评价，这些评价涉及对元代经学的看法。其中顾炎武以及朱彝尊对3部《大全》持否定的态度。有人读书不审，误以为顾氏也贬低元代经学。这是须要辩清楚的。查顾氏只是指斥《五经大全》，是“抄誉”、“全袭”元人成编，取元人“已成之业”，^[16]这并非否定元代经学。顾氏断乎不会为张三抄李四的书就说李四的书不好。再仔细体会，在上引顾氏的那段话里，其字里行间中，倒是说了宋元经学是“实学”。^[17]在顾氏之后的清代考据大家阎若璩，在贬斥《大全》中，也几次说明代300年，“不能直追唐宋及元者”，“不能远追汉唐及宋元者”。^[18]这些都在于说明，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虽贬斥《五经大全》，但并未贬低元代经学。说到这里，又不妨说几句题外的话：顾炎武本来知道钦定3部《大全》，是明成祖诏令胡广，选辑往圣昔贤的成说，“类聚成编”，并非要求胡广等人对经典重新来一套句句发明、字字新义的东西。可顾氏为什么偏要指斥《五经大全》无所发明，全是抄袭前人，上欺下诳呢？其实说穿了，细审顾氏心理，一是他认为明亡是亡于玄虚不实的心性理学，主张尊汉排宋。这就影响到他对以程朱理学为规范的《大全》的看法。二是他对朱棣篡国，惨杀“读书种子”方孝孺，深为忌恨。对迎降逆乱暴君朱棣登位的胡广等人又更是不齿，目为丑类。所以顾氏借这一对君臣搞的《大全》，就起劲地攻击，以致不惜冤诬。显然，顾氏对《五经大全》的贬斥已非限于经学本身的问题，更不涉及对元代经学的贬低问题。